

文本内真实性： 一个符号表意原则^{*}

赵毅衡

内容提要 任何接受者,不可能接受一个对他来说不包含真实性的符号文本,这是意义活动的底线。文本的真实性,必须经常到文本外的经验世界求得证实,但是接受者也可以接受内含真实性的文本。文本内真实性可分为狭义的文本真实性以及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而成的“全文本”包含的真实性。这两种真实性,都必须符合融贯原则,即文本各成分逻辑上一致,或是与“外挂意义体系”一致。如果是艺术虚构文本,则需要依靠情绪浸入与社会感情体系融贯。

关键词 真实性 接受 融贯 文本 全文本

意义活动的底线真实性、替代真实性

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须有接受者,这是传播交流不可动摇的基本原理。在自然符号文本(例如自然灾害是在惩戒恶人)、作者不明文本(例如作者隐姓埋名)中以及在宣布“作者已死”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眼里,发送者——作者的在场性,经常是可疑的,甚至不必要,但是接受者确实不可或缺。接受者是一切传播过程必须有的单元,构成符号文本传播意义的完整途径。本文并不讨论接受者人格的构成以及他解释意义的标准,此问题虽然极端重要,笔者认为“解释社群”理论比较言之有理^①,在本文中却只能暂时搁置。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符号文本的接受者为什么要接受,而不是拒绝一个文本?这种接受的根本底线原因是什么?根本的理由是意识的追求意义本性:意识存在于世,就是不断地在追求意义,也只有意义活动中,意识的主体性才会出

现。但是意义的概念——意义是意识与事物世界的联系——本身,就意味着它是“真实”的,任何接受者人格,不可能接受一个对他来说已经明显为非真实的意义。格雷马斯指出,每个文本接受者在解释活动之前,签下一个“述真合同”(veridiction contract)^②,即相信该文本所说为真。

接受者必须有一个接受文本的动机,这个动机必然是文本具有某种真实性。此种真实性,不是该接受主体的判断的结果,而是接受者有意向接受这个符号文本的意识起码的条件;这样一个接受主体,不一定是追求真理主动意志的主体,而是获得意义的意向性之源头。因此,这种主体不可能提出要求“我就是要接受一个假的意义”,因为接受意义的真实性,是这个接受者人格在位的先决条件。

例如某人看幻想电影,明知情节不可能为真实(例如动物或器物会说话),他却继续看下去,此时文本必然在向他提供某种真实性,哪怕是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号:13&ZD123)的阶段性成果。

常识真实很不同的某种真实性,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文本内真实性”。文本内真实性有各种可能的样式,无论面对哪一种样式,一个接受主体必须在某些语境下,有条件地接受各种文本内真实性。这些就是本文讨论的主旨。

广义的真实,是传达的基础。接收者没有理由接受明知为假的符号文本,例如已经证明是谎言,如果接收者依然听下去,是因为可以穿透谎言,看出某种真实的东西,不然他没有理由留在传达过程中。哪怕他的感知(例如他坐在戏院里)不得不被动接受信息,他的意识可以完全听而不闻,或视而不见,对他而言,传达过程实际上已经中断,因为没有接受的意向性,接受就无法进行。

文本内融贯性

关于真实性的理论很多,其中的一种“融贯性理论”(coherence theory)认为,真实性主要来自对文本的融贯性认定。这意味着说,人判断真实性的标准之一,是文本中各元素的相互一致:逻辑上相关,各元素相互支持。的确,在同一文本区隔出来的意义环境里,各种符号元素互相之间有“横向真实”。这是任何情节发生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找到文本内真实的根本原因。文本内的逻辑融贯,正是逻辑学发展成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学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都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普遍工具”,是“同一探究真理的动态过程”。^③

塞尔指出,虚构文本中的“以言行事”,是“横向依存”的,^④也就是说,在同一文本中,融贯性可以有效地被解释为文本内的真实性。在同一文本区隔中,符号再现并不仅仅呈现为符号再现,而是显现为相互关联的事实,呈现为互相证实的元素。本文讨论的文本内真实性,只是与融贯性理论有关联,并不是用文本意义学说证明这个理论。但是,文本内真实性,与另一个更为传统、历史更为悠久的真实性理论,即“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不相对应。符合论认为真实性产生于文本与经验世界的对应相符。有论者认为“符合论提供真实性的定义,融贯论提供真实性的标准”^⑤。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文本要自圆其说,并且“符合事实”。但是这样的看法适合“文本外真实性”,

本文讨论的文本内真实性,可以暂时搁置与文本外经验世界相符合的问题,解释者可以在文本内,在文本间,找到一定范围内的真实性。因此,本文的看法是“符合论提供文本外真实性,融贯论提供文本内真实性。”

文本要取得这种融贯性,就必须为此文本卷入的意义活动设立一个边框,在边框之内的符号元素,构成一个具有合一性的整体,从而自成一个世界,而边框外的各种符号及其意义,就被暂时悬搁。有了这个条件,真实性才能够在这个文本边框内立足,融贯性才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中起作用。^⑥

不仅如此,文本的此种融贯性,也必须与接受者的解释方式(例如他的规范、信仰、习惯等)保持融贯。文本与解释,实际上形成“互相构筑”的局面,文本不是客观地存在,而是相对于解释而存在。艾柯认为“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文本是解释自己的合法性而建立起来的,要找到解释有效性,只能通过接收者与文本互动,这是一个解释循环“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⑦有解释,才能构成文本。文本真实性必须依赖读者相融贯的读法才能实现,普林斯曾经举过一个特别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用读小说的方式读电话本,会发现“人物太多,情节太少”,反过来,用读电话本的方式读小说,会觉得更差。^⑧

与接收方式互相融贯,说起来似乎十分抽象,实际上很具体,在我们接受任何文本时都会发生。例如电视剧这种当代文本体裁,最容易让观众上瘾,而所谓上瘾,首先必须是“信以为真”,就是信赖甚至依赖其文本内真实性,而且对此种真实性充满了好奇。电视剧的文本内真实性建筑在细节的丰富性之上,几乎“与真实生活一样丰富”的细节,融贯了文本的各个部分,使艺术表现呈现为真实。因为实在事物的一大特点就是细节的无限丰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菩提”。压缩于有限边框(像素、篇幅、时段等)之中的符号文本,绝对不可能穷尽任何事物的细节。但是在文本范围内提供的细节如果很丰富,那么就能让观众产生

已然融贯的幻觉,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艺术,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就是这个原因。

美术理论家格林伯格指出过现实主义美术“与现实无距离”。他建议我们设想一个俄国农民进了莫斯科的艺术馆,毕加索的画使他想起东正教的民间艺术,他感到亲切。但当他转过身来,看到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作品,他立即弃毕加索而崇拜列宾,因为列宾把戏剧性场面画得栩栩如生,使“他感到现实与艺术中间没有距离”^⑨。接受者总是叹服于文本真实,而且把它当做“实在真实”,即他的心目中的客观真实。

文本内真实性,需要文本内各元素互相对应相符,而相符的原则与常识相融贯。1983年根据同名言情小说改编的澳大利亚电视剧《荆棘鸟》(The Thorn Bird),故事情节从1912延伸到1969,讲了一对情人起伏坎坷的一生情史。男的是牧师,为了做主教,放弃爱情。到了白头之时,才明白爱情的真谛,两人才如愿以偿团圆。年代愈久,愈证明情爱无价,有情人难成眷属,终成眷属,令人唏嘘。

这颗重磅言情催泪弹效果极佳,五十年的爱恨情仇,延续成一部动人心弦的凄美浪漫巨著,在全世界收视率居高不下,1983年获得六项艾美奖。16年后,1996年,澳大利亚想拍“续集”,但是剧终时主人公已老,无法再续,只能找到情节中一段空档,即原电视剧没有说的1941~1945年二次大战期间发生的事。于是一部新编电视剧《荆棘鸟:失去的年代》(The Missing Years)问世。可惜这时候原演员班子已经无法寻找。如果是后续,可以说“岁月无情,年龄改变相貌”,既然要换演员,就必须让观众忘记相貌。而人物的相貌,是影视的主要符号元素,这部“中续”(midquel)就落入尴尬境地:既要让观众想起原作(他们才会来看);又要让他们忘记原作(他们才能看得下去)。这部“中续”仅有没看过原剧的人才看得下去,只有他们能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文本。融贯性上的硬伤很让人遗憾,这部电视剧没有能重拾当年的风采。

在同一区隔中,哪怕已经媒介化,文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世界。此时再现并不呈现为再现,虚

构也并不呈现为虚构,而是显现为这个文本世界中的事实,这是区隔的基本目的。语言哲学家塞尔指出,虚构文本中的言语,是“横向依存”的^⑩,也就是说,言语所陈述的事实,在同一文本各元素之间是实在的。

例如,贾宝玉为何能爱上林妹妹?听起来像是一个圈套,实际是老实到极点的问题。贾宝玉爱上林黛玉,自有他的千种道理、万般原因,那是红学家与耽读红楼的少男少女讨论的问题,回答或是才子佳人,或是两人共享某种意识形态,共同敲响封建主义丧钟,或者干脆说爱情就是神秘得没有道理。这些命意或深或浅的回答,实际上都设立了一个前提假定:这两个任务共同存在于一个文本之中。要问他们“为什么会相爱”,首先要问他们为什么有可能互相爱上,而我们文本外的人,为什么只有“艳谈”的份:文本之隔,就是世界之隔。

对同一文本中的人物,文本中的环境、发生的事件、遇到的人物都不是虚构的。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住在大观园中的林黛玉是虚构的,对于贾宝玉却必须是实在的,否则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如何能爱上林黛玉?瓦尔许认为“叙述的作用,就在于让作品读起来像了解之事,而非想象之事;像事实报道,而非虚构叙述。”^⑪巴尔特指出“单层次的调查找不到确实意义。”^⑫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于同一个表层层次中的文本,是一个融贯的世界,其中的事物和人物只对同一世界的其他元素具有逻辑融贯性。对于贾宝玉来说,林黛玉应当是实在的,因为他们在同一文本中,在存在意义上融贯。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只是一个隔着框架可讨论的文本存在,俗称称为“谈资”。

难道只要在“同一个文本世界”,爱情就可能了吗?难道没有时代之隔,地域之隔?难道不是林黛玉恰好寄养到贾府,才造就这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难道许多偶然性,“无巧不成书”是必然的吗?情节如何安排得合理,是文本内次生的条件,是文本生产者的安排,人物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情节假定。但是,从文本的定义来说,首先人物要落到同一个文本世界中,武大郎才会遇到潘金莲,

潘金莲才会偶遇西门庆。

而一旦落到同一个文本中,秦琼战关公就不是“非历史主义”。悖论的是,两人能战一场,条件恰恰就是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既然合到一道说,这事情就有可能。魏明伦的舞台让潘金莲会见安娜·卡列尼娜;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让一个当代作家见到毕加索和艾略特。只要同在一个文本世界,柳梦梅痴爱画上的杜丽娘,能让她死后复活;董永爱上七仙女,能让仙姑下凡。听起来是在强词夺理,实际上却是人类讲故事几千年的实践。文本具有一种内在真实,隔了文本边界就往往不再真实。接受者的意识沉浸到文本之中,就能接受这种局部融贯的真实性。

大卫·林奇导演的电影《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对这种“文本内真实”提出了一个恐怖的反向证明:女主人公说了一段有点装模作样的话,吃吃笑起来说“天哪,真像我们剧本里的台词。”这时响起了导演的声音“停!怎么回事?”演员笑破了戏,是NG,落到了叙述文本的框架之外,应当重拍。但是女人四顾,一切依旧,电影继续,周围是“现实的”房间,没有摄影班子。她吓坏了,站起来慌忙奔跑。她的“破框”没有成功,反而肯定了区隔内强有力的真实:既然落在区隔之内出不来,就不是虚构世界,而是一个实在世界。这是一个超级恐怖的怪异场面,它从反面肯定了“文本内真实”。

处在任何一个再现框架区隔中的人物,不可能看到区隔内的世界是媒介化的符号。区隔的定义,就是隔绝文本世界与文本外世界。文本世界中的人不可能自觉到自己是被媒介化的,他们存在于一个被区隔出来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能给他们提供存在所需的融贯条件。

全文本

既然真实性可以存在于文本内部,就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如何划定文本的边界的问题,但是文本的边界实际上并不清楚,正如本文上面讨论的,文本实际上是解释的结果。“印在封面封底之间”这样的理解,完全无助于文本边界的确立。接受者在解释文本时,不得不涉及大量封面封底

之外的元素,例如标题、作者名、文本体裁等重大问题,而且,印刷文字这样清晰的“文本”,在意义活动中是很小的少数,绝大部分文本没有如此清晰的边缘。

文本的范围的确有多种定义方式:有的文本概念是窄义的,是一个边界清楚的意义表达单元。观察整个意义世界的文本构成,可以看到文本的边界非常不清楚,一个文本往往携带了大量的“伴随文本”,许多的附加元素,这些元素经常不算作狭义“文本”的一部分。文本就像一个彗星,携带了数量巨大的附加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与文本本身几乎难以分解,有些却相隔遥远。伴随文本一直是符号学、解释学、传达学没有研究透彻的重大问题。^⑬

伴随文本不是一些卫星般零散的“周边符号”,而是文本与文化的重要联系方式。任何符号文本都携带了许多社会文化联系,这些联系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解读。甚至,某些伴随文本,可能比文本内的因素意义更为重大。因此,符号“全文本”,是狭义的文本,是进入解释中的各种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把文本变成一个浸透社会文化因素的复合构筑。

例如大部分副文本,完全“显露”在文本表层,可能比文本更加醒目。例如标题、题词、序言、插图、电影的片头片尾;广告的商品、商品的价格等。一首诗,也有标题、作者名等“副文本”元素。

型文本指明文本类型,因此是文本与文化的主要连接方式。文本归属于一定类型,与其他一批文本结合成派别、时代、风格等类别。现代传媒不断创造新的型文本类别,例如由同一个明星演出的电影、同一公司出品的游戏。型文本元素中最重要的是体裁,体裁把媒介固定到模式之中,决定了解释的最基本程式,体裁就是文化程式化分类。

前文本是对此文本生成产生影响的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所有文本的总称,与一般理解的“文本间性”相近,称之为前文本,是指明其方向性:只有在这个文本之前出现的文本,才可能对此文本的理解产生意义压力。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都指向这种影响。

文本生成后,还可以带上新的伴随文本。

“评论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⑭,是此文本生成后被接收之前接受者接触到的,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各种消息、各种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链文本”是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这在网络上体现最为具体:网络阅读者不断跟着链接走。“先-后文本”是多个文本之间的组合关系,电影都有原小说或电影剧本作为其先文本。在社会的符号表意中,先-后文本几乎无处不在:例如创作一首歌,必考虑如何推动大众传唱,而大众传唱的,大多是已经广为流传的歌。

所有这些伴随文本,主要功能是把文本与广阔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从这个观点说,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摆脱各种文化制约,它们只有在各种伴随文本因素环绕之中才能表达意义。没有这些伴随文本的支持,文本就落在真空中,无法被理解。无论是发送者还是接受-解释者,不可能不靠伴随文本来构成完整的文本。想要用摆脱文化束缚的纯粹心灵来观照文本是不可能的,在人类文化中,既没有纯文本,也没有纯解释。文化的定义,是“社会相关表意行为的总集合”^⑮。任何文本的解读,不可能不落到文化的各种文本联系之中。

观察各种伴随文本,可以看到,某些伴随文本已融入文本,做任何解释时,都不可能让接受者剔除。由此出现“全文本”概念:凡是必须进入解释的伴随文本(例如标题、体裁),都是文本的一部分。文本讨论的文本内真实性,就是全文本各种要素,包括必须的伴随文本在内的“融贯性”,也就是说文本内真实性不仅产生于狭义的文本之中,不仅是文本内部各因素(例如一部电影情节的前后对应),也在于文本与必须进入解释的伴随文本因素之间的呼应和融贯性。固然不同的读者-观众会对伴随文本(例如电影明星的社会声誉)有所取舍,但是他们对狭义文本内的元素也会有所取舍。因此,如本文上面已经声明过的,笔者取“解释社群”作为接受-解释的标准。

全文本内的真实性

读者的意向性,就是在文本中寻找一个“证实条件”(conditions of authentication)^⑯,而要让这

样一个社群接受者愿意解释一个文本的“全文本内真实性”,可以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

a. 筹划真实性:相信此文本能告诉我们某种筹划,可以由实例化给予补足(例如一张设计图纸,其真实性来自其成形可能);

b. 文本间真实性:相信此文本能与过去确认的文本声称的真实情况互相印证(例如阅读历史时,找到新的材料夹在某些被再次言说的说法之中);

c. 心理真实性:相信此文本能揭示发送者的某种真实情况(例如听明知的谎言,看发送者的心理状况);

d. 文本形式真实性:相信从此文本可以看出某种形式技巧的真实性(例如从某种布料看纺织工艺)。

所有这四种“文本内间接真实性”,虽然求证的过程延伸到狭义的文本之外,但是它们与“符合论”要求的经验世界对应性很不同。它们的逻辑基础,都是“与某种更大的范畴相融贯”,只是这“更大范畴”的真实性,处于接受与解释潜在的背景之中,不一定要在本次意义活动中证明。“证据仅仅是一种真实关联度的符号,而不等于事实本身。”^⑰例如上述第一种(筹划真实性)显然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暂时无关,而是靠这种对应可能性来判断文本内真实性;上述第二种(文本间真实性)与一个文化中累积的其他文本的地位相关;第三种(心理真实性)与想要了解的心理状态的真实性的相关性;第四种(文本构造的真实性)与意义构造方式的形式体系相关。

为获得这些“全文本”规模的文本内真实性,接受者把被解释的文本的真实性,依靠各种元素,挂在各种文本间体系之上。而这些外挂文本间体系,只是真实性暂时无需置疑的大规模体系,群体文化生活所认可的常识体系、逻辑体系或知识体系。例如某个历史言说文本,只是与我们的文化认可的历史知识相融贯。“全文本”所包含的各种伴随文本,即是与这些外挂文本间体系实现融贯,从而获得局部真实性的方式。

如果接受者对文本的任何可能的真实性不再有获义意向性,比如对发送者品德完全失望(例如发现抓到的俘虏不可能接触相关机密),甚至

对此人的作假人格都不再感兴趣(例如教师不想再与某谎瘾儿童周旋),对对方说出任何真实的可能性放弃希望(例如放弃审讯一名囚徒),或者对这一类别的文本完全失去兴趣(例如视同屋人放的广播为噪音)等,此时符号传播就只能中断。

上述的第四种真实性,即“文本形式的真实性”,看起来包括了我们欣赏其形式的一切文本,尤其是艺术文本。实际上一件艺术品成为我们乐意接受的文本,因为它包含了多种文本内真实性,并不完全局限于“形式之美”,例如,读《诗经》,并不是只试图找到形式真实,孔子觉得《诗经》文本能“兴观群怨”,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本歌词文本的另外几种文本间真实性,并不完全是文辞音韵之美。

虚构文本的真实性

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不同题材的文本、文本真实性品格有所不同。最明显的莫过于虚构与纪实的体裁差别,召唤出“真实性”的机制很不相同。本文上述讨论暂时搁置了虚构的特殊性,把虚构与纪实同样处理,而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引起各种争议,必须仔细分辨。应当说明的是,虚构不一定是艺术的专利:有些纪实性文本(例如纪录片,例如名家日记),可以很艺术,以情动人,但是并非虚构。我们大抵上可以以虚构作为艺术性文本的特点,因为虚构这种体裁,前提是否定文本外真实性。如果本文能说明在虚构文本内如何发现真实性,就对解决本文讨论的难题大有帮助。

很多论者认为虚构类的叙述,其真实性来自于“放弃不信”(suspense of disbelief)。因为虚构文本本无真实性,不信是自然的,相信才是一种认知异常现象,而这种相信的来源,是“感情”上的认同,造成主体意识的“代入”(identification)以及心理情绪的“浸入”(immersion)。艺术用的是一种“情感语言”,对于情感在人类意义活动中的地位,历来争议颇多。例如强调理性的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认为欲望是动物性的,命题语言代替情感语言,是人性产生的标记,“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的区分,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⑩

卡西尔说情感语言低一等,或许有道理,但是

人性本质上就是不完美的,感情正是艺术文本的“文本内真实性”的源头,既是虚构叙述期盼读者“搁置不信”的理由,也是作品对读者产生“浸没”(immersion)效果的来源。既然虚构叙述的作者无论如何设置区隔,区隔内的世界依然被该世界的人格当做经验事实。读者也可以认同区隔内的接受者,忘却或不顾单层或双层区隔。一旦用某种理由漠视框架,虚构文本本身与纪实文本,可能会有风格形态的巨大差异,却没有逻辑地位的不同。

虚构文本的文本内在真实性,依然要依靠文本内各种元素的融贯。钱锺书称之为“事奇而理固有”,他比之于三段论(syllogism),艺术的不经无稽,可以“比于大前提,然离奇荒诞的情节亦须贯穿谐合,诞而成理,其而有法。如既具此大前提,即小前提与结论本之因之,循规矩以作推演”^⑪。钱锺书指出的就是文本内融贯性:情节已经太奇怪,细节就必须尽可能以常识逻辑融贯。他举的例子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孙悟空与牛魔王斗法,都是你变一兽,我变另一兽,你变是荒诞不经,一物降一物却是符合常识。《管锥编》2007年再版本中,又增补了不少例子。从格林童话,到西方民谣,到卡尔维诺,到《古今小说》到《贤愚经》:看来各民族都喜说魔术,而斗法之道必须强弱分明。

但是虚构文本更需要的是以情动人,而情感正是虚构文本真实性主要的“外挂文本系统”,与纪实性文本主要外挂经验系统完全不同。例如前文所说的四种局部真实性,依然可以产生,只是感情外挂,原因很不相同:

- a. 筹划真实性:此种虚构文本有待感情的实例化(例如读小说,有待社会正义道德感情的激发);
- b. 文本间真实性:此虚构文本与过去文本互相印证(例如读历史小说,读者预知事不可为,产生悲剧感);
- c. 心理真实性:此虚构文本能揭示发送者的情况(例如读小说揭示作者的潜意识);
- d. 文本形式真实性:此虚构文本的技巧(艺术美导致的审美感情)。

这就是各种“虚构真实性”的根源“现实主

义”小说的大量细节真实,“现实主义”绘画的栩栩如生,只是能帮助读者外挂到生活经验体系上,与纪实文本的外挂方式实际上相同。此种外挂不能保证读者的真实性意向得到满足。对读者的心理产生“浸没”,起决定作用的是感情上的投入,而这种感情投入,又来自读者认同虚构作品最下工夫处理的“道德感情”与“审美感情”。情感的强大力量,可以擦抹掉虚构文本的框架,建立起解释者所需要的文本内真实性。

一旦感情投入起作用,读者会觉得自己生活在真实的经验之中,感同身受,任何明显的区隔标记(例如封面标明是“小说”),任何风格形态的差异标记(例如人物视角的个人化叙述),甚至任何情节的怪诞(例如《冰河世纪》中野兽的爱情故事),完全不现实的媒介(例如动画的平面,或造型夸张的模型),只要能“感动”接收者,这些文本框架都能被擦抹掉。无论何种区隔内的叙述文本,其情感引导机制为这种接受者发现“文本内真实性”提供了基础。

尼采说“我们始终认为一个正常的人,不管是何种人,必定认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个经验事实。”^⑩可是,如今我们天天见到的人,“不管是何种人”,经常把媒介再现当做经验事实。看来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人,在面对艺术品时,感情上反而更天真了,也或许是另一个原因在起作用:今日媒介表现手段(例如电影的逼真性)更为老练,更容易让人接受文本内真实性。

文本内真实性,必须符合融贯原则,即文本各成分逻辑上一致,意义上相互支持。这种文本内真实性有两个大类,狭义的文本真实性,即文本内部各元素的融贯。另一个大类,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而成的“全文本”真实性,伴随文本使文本与广大的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文本内因素必须与各种“外挂意义体系”相融贯,例如艺术虚构文本,则需要依靠接受者的情绪浸入,与社会的道德感情体系融贯。文本内真实性,是人类社会符号表意的基本原则,人不可能接受不包含真实性的文本,但是各种文本内真实,经常能满足接受的条件。

- ① Stanley Eugene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6.
- ②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Frank Collins and Paul Perron, “The Veridiction Contract”,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0, No. 3, Greimassian Semiotics (Spring, 1989), pp. 651 ~ 660.
- ③ 张留华《皮尔斯为何要把逻辑学拓展为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辑。
- ④⑩ “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 in John R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9 p. 59.
- ⑤ 李主斌《符合论 vs 融贯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9期。
- ⑥ Robert Stern, “Coherence as a Test for Truth”,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September Issue, 2004.
- ⑦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 ⑧ Gerald Prince, “Narratology, Narrative, Meaning”, *Poetics Today*, Fall 1991, p. 543.
- ⑨ Clement Greenber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6, Vol. 1, p. 11.
- ⑪ Richard Walsh, “Who Is the Narrator?” *Poetics Today*, Vol. 18, No. 4, Winter 1997, p. 34.
- ⑫ 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言》,载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 ⑬ 请参见拙作《符号学》第六章“伴随文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9页。
- ⑭ 拙作《符号学》一书中,沿用热奈特的术语,称这种伴随文本为“元文本”(meta-text),这个词很容易导致误会,“元”使用过多,造成意义混淆,因此此处改用一个术语。
- ⑮ 参见拙作《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4页。
- ⑯ Claudia Ferman, “Textual Truth, Historical Truth, and Media Truth”, *The Rogobetta Menchu Controversy*, (ed.) Arturo Arias,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156.
- ⑰ 孟华《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谈证据符号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2辑。
- ⑱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 ⑲ 钱锺书《管锥编》卷二《楚辞洪兴祖补注》,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05页。
- ⑳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页。

作者简介:赵毅衡,1943年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刘蔚)

ABSTRACTS

(1) Text Authenticity: Principle of Symbolic Token*Zhao Yiheng* • 22 •

It is not possible for any receiver to accept the symbol text without authenticity, which is the bottom line of significant activity. The text authenticity should often be proved in the experience world outside the text, yet the receiver can accept the text with authentic content. The authenticity inside the tex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ext authenticity in narrower sense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verall text”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text. These two pieces of authenticity must meet the needs of coherence principle, that is, to be in logic accord among the text elements or to be in accord with “external significanc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implant emotions and blend in social feeling systems if the text is artistically imaginary.

(2) Encounter of Utopia: The Dilemma and Possible Solution of Deleuze's Concept of “Difference”*Wu Jing* • 62 •

Deleuze's concept of “difference – in – itself” inverses the conven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and therefore redefines an ontology of difference. However, provid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leuze's metaphysical theory, this ideal concept also reflects a political impotence. The question of creating – differ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culture that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logic. With the spreading of the e – media and internet, the territorial character of cul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ctional in the globalized atmosphere. The particularity in culture, based on territory, has turned into an exhibition of exception in a virtual world of multiplic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difference exists as an object pursued by a globalized culture industry. Difference is really legitimized while losing its own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is being produced and consumed. Difference is created as a totalized commodity. Therefore, difference in this sense is unable to demonstrate a real cultural multiplicity founded on equity. On the contrary, a globalized market only accepts an assimilated uniqueness. It is a pseudo – difference. Deleuze slides over this question. It is indeed the dilemma throughout Moore's Utopia and modern science fiction.

(3) On Era Connotation of “People's Richness” and I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Luo Zuchun Wu Xianman* • 82 •

“People's richness” was put forwar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hen he was visiting Jiangsu in 2014. It is a concept with overall importance and marking significance. The essence of “people's richness” is to let the masses share mor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re is to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ased on the view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gres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people's richness” may go along the prim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forms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s on “people's richness” in the provinces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Guangdong, the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stic of mutual catch – up. As far as the development index concerned, Jiangsu is listed as the first, Zhejiang the second, and Guangdong the third. However, towards the horizontal index, Zhejiang is the first, Guangdong the second, and Jiangsu the third. The feasibility to steadi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eople's richness” is to make the masses rich by way of development, capital, social welfare, redistribu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to take care of the people's psychological changes as well.

(4) Reasons, Effects and Methods of Carbon Tax Levy under New Normal*Wang Xiaohong Yao Yao Li Zongyao* • 90 •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ax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is the key measure to initiatively adapt to and lead the new normal as well. The impact of carbon tax on the macro economy is mainly reflected through consumption, invest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ax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n the coal – based energy structure;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tax on the level of macro tax burden, the initial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ax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early low tax rate.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key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ax is to insist the tax neutrality princi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l tax rat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5) Electron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eriod of “Internet plus”: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Direction*Li Jin Liu Hong Liu Shantang* • 102 •

As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internet thinking, “internet plus” has ignited a revolution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oduced thinking of “internet plus human resource(HR) management” and facilitated the for-